

## 第二十章

---

### 迷茫……

一天，顾问的美国“比克”汽车开到了司令部，下车的却不是内田顾问，而是他的夫人和女儿多莎子。由佐藤恭迎到了顾问室内。

当时我正在军法处和几个军法官研究处理“洪中校杀人案”，佐藤跑进来抓住了我，对军法处的仓持大胖子说了一句：“对不起，顾问部有要事需要左君去办。”就拉着我拐到了军需处。只见他对日本军需中校高村耳语了几句，在一张纸条上签了个字，就领出了现金两千元。上楼途中告诉我：“咱们一块儿陪夫人上街去。”打开副官处的门，伸进头去只说了声：“吾妻副官，顾问夫人借用左君一个上午，对不起！”不等回答便拉着我走了。

我向内田夫人鞠躬问好，多莎子站起身来向我点头招呼：“今天好。”我注意到内田夫人的头发又到该染的时候了，上车时，我本应坐到前头司机旁边，却被佐藤推到了后边的夫人身边。途中，夫人问我要买些皮货到什么地方为

好。我告诉她，中央大街俄国人开的商店里货物最好、最全，于是汽车便直向道里区最繁华的大街开去。

这里的国际商店比比皆是。珠宝店、百货店、皮货店、西餐厅一家挨一家。只要你有钱，想买什么都能买到。叶山把汽车停在“松蒲洋行”的街角。我们先走了几家犹太人开的商店，夫人都没太满意。最后才在一个白俄老夫妇开的皮货店里停留下来。那一长列大橱窗里陈列着各种白狐、银狐、黄狐的皮筒子，还有皮领、披肩、手笼等皮制品，做工精巧，琳琅满目。最后夫人选中了两条白狐、两条银狐。白狐标价四百五十元，银狐为二百五十元。我和多莎子用不太熟练的俄语和老板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五百元成交。老夫妇俩眉开眼笑，将皮货装入纸盒中交货。佐藤付款。老夫妇俩一直将我们送出大门。走在最后的我好像觉得那老头子在后边捅了我一下，但我没在意。原来这俄国老头已看出我是中国人了，立在门口用汉语连说：“谢谢，请再光临！”

时近中午，夫人请我们一块儿到公馆去吃了午饭。临走时，多莎子送下台阶，悄声在我耳边说：“左君，晚上八点半，在秋林洋行门口等你。下课时间合适吗？”我一时没有精神准备，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可以。”

与佐藤分手时，我请他代我向副官处告假，下午我要按时去大学上课。佐藤连说：“OK，辛苦了。”登车回司令部去了。

步行回家的路上，我想抽支烟，却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了两张十元的钞票。哦，这是那俄国老头捅我一下时塞来的小费，这二十块钱可以买四袋“双合盛”高级面粉，够我全家吃三个月！心中一乐，嘴里哼起了京戏……

晚上放学后，照例与王升利同路，在电车站，我将他送上了车自己却在站台上向他摆了摆了手。他从车窗里伸出戴着大眼镜的头冲我大叫：“嘿！你小子今天有鬼……”电车咕咚咣当地开走了。我则悠然地慢步走向秋林洋行，途中买了十个松花蛋装在纸盒里，打算送给多沙子。这个日本小丫头肯定没吃过这种东西。给她时得叮嘱她吃时最好蘸点蒜泥、酱油……

不夜城哈尔滨仍是灯红酒绿，一派虚假的繁荣景象。上层人物夜生活的奢侈、糜烂与清晨时街头巷尾冻饿倒毙的“死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中，秋林洋行的橱窗早已灯火辉煌，照得行人毫发毕现、眉清目楚。多沙子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正在和一个卖花的白俄老太太唠着什么，大概是在练习俄语吧？抬头发现了我，立刻高兴地向老太太说了声：“再见，晚安！”就跑到了我身边。挽起了我的胳膊：“你真讲信用，我真高兴！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建议找个咖啡店坐坐，她却坚持：“今晚只要散步，在徐徐的晚风中慢慢走着该是多么美啊！”说着就哼起了日本小调《黄昏的马车行》。我们缓步向西边繁华的“喇嘛台”方向走去。

“喇嘛台”其实是俄罗斯东正教在哈尔滨修建的一座大教堂，与佛教的“喇嘛”风马牛不相及，不知哈尔滨的老百姓为什么给它起了个这样的怪名字，实难考证。但是叫起来倒是挺顺口，久而久之，闻名遐迩。外地人来哈尔滨要是打听大教堂在哪儿，被问的人一定会发愣半天，因为这里的教堂太多，足有二十几座，什么圣索菲亚、圣玛莉亚等等，人家不知你问的是哪一个。但你只要一提“喇嘛台”仨字，哈

尔滨人立刻就会指给你看：“喏，就在站前不远那个广场上，大尖顶的木头房子！”

我和多莎子站在东大直街展目西望，在紫金色晚霞的映衬下，“喇嘛台”像一幅精巧的剪影，镶着金边，折射出西方宗教艺术迷人的光彩。它伫立在西方的天幕上，美得让人眩目，让人惊叹！……

哈尔滨，这座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人称东方的“小巴黎”，正是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造型各异、精巧绝伦的宗教建筑才显得这样美丽动人。“喇嘛台”在哈尔滨市民的心目中绝对是一个庄严、神圣、代表着哈尔滨市容特征的伟大建筑！

日俄战争以前，大约1908年左右，俄国人从欧洲聘请来许多能工巧匠，在中国民工的协助下，不用一根铁钉，不用一砖一瓦，完全使用硬柞木削刨砍凿，历时三年，终于将这一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这个词用得不太准确，据考证在全世界上与之相同，完全木结构的教堂还有一座，在莫斯科）矗立在中国的土地上。

据说，当年的喇嘛台虽系木制，但金漆油彩，将它装饰得富丽堂皇。最高处，钟楼尖顶上的十字架被太阳一照光华耀眼；墨绿色的斜顶，金色的屋脊、雨搭，五色彩绘的廊柱和各种颜色玻璃镶嵌的门窗，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显得十分和谐而又华贵，令人叹为观止。它的最高层，那个锥形的钟楼里悬挂着一口巨型的青铜大钟，钟身遍体花纹，刻铸着圣经上的人物和故事。周围的四个小钟塔里还有四个稍小些的铜钟，每当礼拜天或者举行什么宗教典礼和婚礼时，大钟、小钟一齐敲响，声音洪亮悦耳，节奏悠扬，十几里外都能听到它那美妙浑厚的声音。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使它油漆褪色，铅华尽洗，显露出一种灰褐色的沧桑容貌。但它仍是那样雍容、优雅、端庄大方；钟声仍是那么洪亮、悠扬，像一阵阵和风抚慰着哈尔滨百姓们苦难深重的肉体 and 灵魂……

走进教堂的大门，中央是一个方圆约八百多平方米无一根廊柱的大厅，足可容纳五六百人集会和祈祷。大厅的东、西、南、北各有一个门，对着广场的四条街道，供人出入。西方的大门上圆拱形的窗户是用黄色透明的玻璃镶成一个大型十字架，十字架中间是一尊木雕的耶稣受难像。东、南、北门上则为彩色玻璃镶拼成圣父、圣母和带翅膀的小天使图案。讲经台坐西朝东，两侧设有唱诗班和管风琴伴奏的席位。每当礼拜日，苏、美、英、法、德、荷兰、丹麦等各国的侨民、领事馆官员、家属，还有中国人，形形色色齐聚这里，在唱诗班的带领下和着管风琴优美的乐声一齐高唱赞美诗，大声地祈祷、诵经。美妙的歌声，闪烁的烛光，一张张不同肤色、发色，瞪着蓝色、黄色、黑色眼睛的脸，同显出一种圣洁的表情。那种气氛，那份神圣和虔诚，不论你是不是教徒都会使你感动得心房轻颤，热泪盈眶……

喇嘛台的周围栽种着许多丁香树和长青的柏树。夏天，淡紫色、青白色的丁香花开得如云似雾，香气袭人。许多中外情侣都特意选择这个季节到这里来举行婚礼，接受牧师的祝福，彼此海誓山盟，永远相爱，祈求幸福的生活和人类的和平……可惜的是，解放后，大概是“文革”时期吧，这座伟大的建筑，这个西方宗教艺术的精品，在某个掌权人的指示下被无情地拆除了！据附近的老百姓说，光拉木料的汽车、马车就奔忙了三个多月。不知这个决策人叫什么名字，是哪一级的领导，他用权力从中国的土地上毁掉了“喇嘛

台”大教堂，但他的名字和灵魂将永远被历史钉在愚昧和专横组成的十字架上！

我和多莎子从大教堂谈到了俄国的宗教，从俄国的历史谈到了“日俄战争”和如今的“满洲国”。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关于“历史”关于“满洲国”所说的一切，都是日本统治者哄骗我们喝下去的一杯掺了假、变了味的苦酒。

美丽富饶的满洲，从古至今都是日、俄两国觊觎、掠夺的对象。为了巩固、扩大它们在中国的殖民地，两个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像两个丧心病狂的强盗相遇在被他们闯入的平民家园里，为了独占别人的财产而大打出手。

十九世纪初，发生在旅顺口的日俄战争就是这种争斗的集中表现。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旅顺军港，各自投入了庞大的军队妄图一举将对方击溃，赶出这块沃土。面对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这场战争，懦弱的清王朝不但不抗议、制止，反而公开声明与己无关，严守“中立”！听凭虎狼在自己的家园中厮咬争斗，使这块美丽的土地饱受摧残、蹂躏而遍体鳞伤。

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为了巩固他们在满洲的殖民统治，妄图永远将这块沃土纳入日本的版图，对满洲的历史进行了用心险恶的歪曲和篡改。在我们学校里教的历史课中，日本老师从来不说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侃侃而谈的全是大日本帝国战胜沙俄的赫赫战功和日本海军从俄国人手中夺下旅顺军港的丰功伟业。让我们牢记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元帅乃木大将和海军元帅东乡的战功、事迹。并将乃木大将写的几首诗词让我们用日语反复背诵。

我能记得的其中两首如下（汉语译意）：

其一：男儿立志出乡关，战不成功誓不还。枯骨何须埋故土，满洲处处是青山。

其二：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腥风新战场。征骑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我们小学生哪知道什么叫丧权辱国。在那种奴化教育下，都把两个战争狂人当成英雄来崇拜和颂扬。在日本老师的鼓励下，我常在某些学生集会上双手叉腰大声地用日语把这些侵略者的狂言当成颂歌朗诵出来，博得一片掌声和喝彩。

日俄战争虽然是日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从此与俄国结下了世仇。俄国人也时时刻刻地耿耿于怀，咬牙切齿地要报这一箭之仇。至今关东军还把苏联当成主要敌人来防范，我们江上军的一切军事措施都是针对着北部边境苏联那方的。然而，我和多沙子这两个异国青年，当时哪里懂得什么是真实的历史，都把学校当局灌输给我们的东西天真地接受下来，还津津乐道。

我们边走边谈，多沙子什么都和我说，毫无忌讳，“爸爸近来心情很不好，现在正在家里打麻将呢……明天可能去上班。”

又说：“你喜欢日本和日本人吗？可我很爱满洲，特别是哈尔滨。充满了异国情调，真是妙不可言……战争会停下来吗？将来会怎么样，日本会战胜吗？战争真可怕……”

面对这些天真加糊涂、可爱又无奈的问题，我只能哼哈地应付着，经常答非所问。而她似乎也并不认真地需要答复，只是将一个日本少女对世界的困惑和生活的向往随意地流露在我的面前，叫人无法去指责、怪罪她。

在晚风吹拂，小曲哼唱中不知不觉已经消磨了一个多小

时，我感到有些疲倦，便将她送到了公馆附近的街口，顺手把那盒松花蛋交给了她。她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我还以为是你的教科书呢！”我告诉她是好吃的。在昏暗的街灯下我与她握手告别。她跑开两步却回头冲我“飞吻”道：“再见！”

望着她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一种莫名的惆怅弥漫了我的胸膛，心中实实在在地为这个少女的命运担忧。看来，她对世界上发生的事知道得很少……那道横在我与她之间的鸿沟，那么深，那么暗。其间涌动着尸骨、血泪和民族仇恨，而这个纯真的少女却无视它的存在。是梦想的光环晃花了眼睛，还是想用温情和浪漫将它填平……我长叹一声，摇摇头往家走去。那里有我的老婆和孩子。

江上军改制以后，为了检验舰队的战斗实力，曾于1943年春天在佳木斯附近的水域上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演习。第一舰队的四艘主力舰全部参加了这次行动。这次射击并无具体靶标，就是对空中开炮。说是防空演习吧，其炮弹射程才一千五百米左右，怕连苏联飞机的毛都够不着，而且由于经费有限，每舰只给了十发炮弹，充其量算是“试炮”而已。

当那些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的大型舰炮开炮时，炮声震耳欲聋。一些新入伍的士兵哪见过这等架势？加上水上舰船不比陆上的炮兵阵地稳实，在火炮的威力下，舰身抖动，铁甲震颤，连舱内的玻璃都震碎了，真是叫人惊心动魄！吓得这些人一个个脸色惨白，双膝发软。不少人捂着耳朵，闭上了眼，惹得日本军官又是一顿大骂。我当时正在舰上，站得又离炮塔挺近，也被炮声震得心惊胆裂，面无人色。好歹算咬



牙保持了立正的姿势，没出洋相。

演习场面虽然壮观，但因无靶子，炮弹全是在空中开花，根本没有弹着点，不过就是把炮弹发射了出去而已。总结时，却宣布战术成绩良好，不知是怎么判断、评价的。总之，这种水平在每次与苏联人交锋时都是一败涂地，常常损兵折将，军舰叫苏联人打得像漏勺一样。

由于新兵的不断补充和大批陆军军官的调入，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江上军似乎已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一些海军出身的老年日、“满”军官先后回国、回乡，同时，全军上下官兵的服制也更换得差不多了。只有少数舰上的官兵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或是留恋这身海军服，迟迟没有更换服制。其间，那个在富锦告密鸦片问题的张家珍上尉被林参谋长调到了司令部副官处。林参谋长多了一个耳目，副官处多了一张桌子。至此，一个部门四个官，职务重叠，工作扯皮，又各为其主，好戏便经常上演。这家伙自认为有林保治当后台，无视江北兵变的教训，劣性不改，不但对士兵厉声厉色，就是对中尉朱副官也常以大压小，处处刁难。对我他更没放在眼里，本是勤务兵的事他也常常对我指手画脚。我却不买他的账，他叫我干的事我转身再派勤务兵去办，气得他常用老味味的日语，磕磕巴巴地向日本人告我的状。一次，他有意无意地告诫我摘去腰上海军军官的蓝色“刀绪”，出入大门要向哨兵敬礼。我心里在骂他：你姥姥个粪！口中顶他：“我不敬礼又怎么样？有规定吗？违犯军纪吗？”他干卡巴着大眼皮，再没屁放。久而久之，有了积怨，这小子上下乱窜到处在日、“满”人之间埋汰我，挑拨离间，惟恐天下不乱。一天，他的亲信、军械处的王少尉到副官处

来要卡车的出车证（一种归我管的小木牌），我推托说：“现在没车。”其实这小子受过我的恩惠。他是海军出身，通考候补少尉军衔时是我给他偷的考题，如今穿上少尉军服就不认识我了，常和张家珍一起背后拆我的台。这小子听我这么说，冷笑一声，便来拉我办公桌的抽屉。这个引线一拉就炸了，我啪的一个大耳光扇在了他脸上。吾妻副官吃了一惊：“喂，怎么打起来了！”张家珍则手叉胸前，等着看热闹。王少尉也不示弱，回手对我腮上就是一拳。于是我们俩就在办公室里交起手来，吓得勤务兵们呆在一旁不知是劝还是拉好。这个身高才一米六的王小个子怎打得过我这一米八的大个子？我一把抓住他右臂来了个近身大背，一下将他扔在了地上，扭过他胳膊用皮鞋踏住了他后腰。这时，佐藤正好路过门口，看到了这场把戏，喊了声：“住手吧，年轻人！”借机我才把脚抬开。没想到王少尉这个“男子汉”竟放声大哭，抹着鼻涕眼泪爬起来跑去向他日本干爹告我去了。我连忙把弄乱的衣服扯平，端正领带，顺手将抽屉里的木牌摆在了桌角上。佐藤离去时，笑着对我说：“你小子是柔道初段吧！”

果然，不一会儿，中野少校气冲冲地来了。我忙向他道歉，双手送上出车证，他满意地点点头。临出门，回头对吾妻副官说：“今后，这车牌子还是归你来管为好。”